

数字文明时代老年教育的逻辑困境与制度路径

马丽华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上海 200062)

[摘要] 在数字文明持续演进、人口出生率下降和深度老龄化加速的时代背景下,老年教育正面临制度定位模糊、价值逻辑滞后与运行机制分散等挑战,难以有效回应日益多样化、发展性的学习需求。本研究结合历史演化、理论范式与实践转型的三重逻辑,发现老年教育面临知识正当性弱化、教育本体缺位与结构性制度错位等深层困境。针对上述困境,文章提出我国需从教育权利、治理机制与文化功能三方面系统推进制度重构:确立以发展权为导向的教育正义逻辑,厘清制度归属与公平目标;构建数据驱动的协同治理机制,实现资源精准供给与平台协同;嵌入文化功能与知识转译机制,强化经验表达、代际共建与数字参与。该制度配置路径有助于推动我国老年教育从福利附属地位转向公共服务职能,提升其在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的战略地位,形成兼顾数字公平与代际融合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 数字文明;老年教育;终身教育;逻辑困境;制度配置

[中图分类号] G7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179(2025)05-0111-10

一、问题缘起

自2017年进入“算法时代”以来(Anderson et al., 2017),数字技术正深度塑造新的“数字文明”(廖小丹等, 2023)。中国式数字文明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中国化、时代化成果,是“数字中国”推进中的制度生成(崔建西, 2025)。数字文明是“文明社会数字化”和“数字社会文明化”的融合体,彰显了技术形态和人文价值的辩证统一(肖峰, 2015; 刘卓红等, 2022),推动着既有教育制度结构的系统性调整。

在我国,出生人口持续下降与深度老龄化并行(国家统计局, 2025)。预计到2038年,低龄老年人占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超过三分之二。少子化将导致学前至高中阶段学龄人口在未来10—15年内持

续下行,高等教育学龄人口亦将在2035年前后转入下降通道(马晓强等, 2025)。“少子—多老”的人口结构性转型,使教育战略重心由“儿童优先”转向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终身学习体系的构建,老年教育因此成为实现教育公平与提升社会韧性的关键环节。

然而,算法逻辑主导下的“加速社会”与老龄化进程形成的“减速社会”张力叠加,使老年群体被系统性地推向数字转型的边缘。所谓“代际鸿沟”,不再是经验代差,而是数字原住民与数字移民在知识结构、话语方式与技术素养上的系统性分裂。老年教育面临的挑战,不仅关乎技术适应,更深层地关涉知识合法性、发展权保障与认知主权等制度性议题。在平台算法构建的注意力生态中,老年学习需求常被边缘化、文化表达受限、认

[收稿日期] 2025-05-10

[修回日期] 2025-06-23

[DOI编码] 10.13966/j.cnki.kfjyyj.2025.05.0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职继融通’服务老龄社会的路径与机制研究”(BJA220248)。

[作者简介] 马丽华,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老年教育、终身教育(malihua5@hotmail.com)。

[引用信息] 马丽华(2025). 数字文明时代老年教育的逻辑困境与制度路径[J]. 开放教育研究, 31(5): 111-120.

知能力被误读,由此导致教育正义与价值尊严的双重失落。

既有研究多囿于工具理性的思考框架:或将老年教育附庸于养老服务,忽视其在代际契约与文化再生产中的深层意义;或侧重供给层的数量扩张,忽略老年学习者认知需求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或将“技术赋能”简化为“适老化”,遮蔽了算法偏见、平台垄断对教育公平的结构性侵蚀。作为“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同时面临“未备先老”制度滞后与“老而弥新”发展诉求的双重压力:前者表现为教育体系与数字转型节奏不一,制度准备不足;后者体现为老年人对表达空间、参与机会与终身成长的强烈期待。当这两种力量在技术、制度与文化维度叠加碰撞,老年教育就不仅被赋予弥合认知断裂的现实责任,更被寄予在数字文明中重构代际共生秩序的历史使命。

基于此,本研究以“数字文明时代老年教育的三重逻辑困境与制度路径”为核心议题,构建“逻辑困境—制度配置”的双维分析框架(见图1):一方面,立足于历史、理论与实践三重逻辑,系统梳理老年教育知识范式的断裂与制度响应的滞后;另一方面,围绕制度价值重构、运行机制优化与文化功能嵌入三大路径,提出以“发展权”为导向的教育正义逻辑、以数据驱动的协同治理模式,以及以知识转化与代际共建为核心的文化重构机制,以回应“技术—资源—制度”三重张力带来的体系失衡问题。研究旨在回应如下两个问题:在数字文明加速演进的背景下,老年教育如何从“照护导向”迈向“发展导向”,实现从“适老技术”到“认知主权”的理论跃迁?如何通过制度机制的系统性重构,打破教育公平与数字能力之间的结构性障碍,使老年教育融入社会主结构,形成中国特色的代际共生教育新范式。

二、三重逻辑困境

老年教育作为现代性矛盾的典型折射,远非技术手段或资源配置所能涵盖。从生命价值和社会需求看,老年教育不仅是知识更新的重要机制,更是文明赓续的制度性实践。随着数字文明的演进,老年教育的内涵已突破传统教育学范式,呈现融合知识正义、代际伦理与文化再生产的复合性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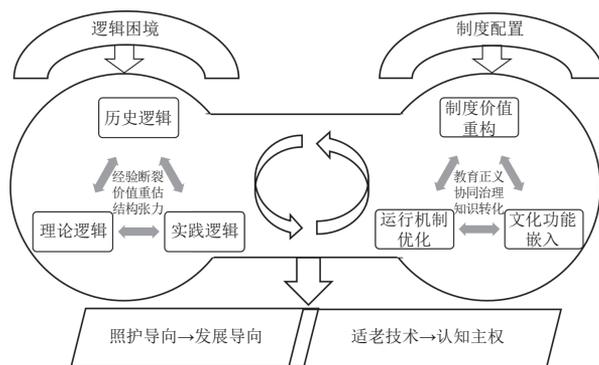


图1 数字文明时代老年教育的三重逻辑困境与制度配置分析框架

这一议题的多维复杂性,意味着亟须跳脱工具理性框架,重新定位老年教育在数字社会的社会功能与认知结构。尽管学界关注老年人“数字化生存”带来的学习诉求变化与认知适应过程(罗强强等,2023),但系统化、理论性回应仍显不足。为此,本研究提出以“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为分析支点,构建理解数字文明时代老年教育重塑的系统性逻辑框架(见图2)。其中,历史逻辑旨在追溯经验知识合法性断裂与代际秩序变迁的根源逻辑,理论逻辑聚焦老年教育本体属性与知识生产机制的范式转型,实践逻辑旨在揭示数字转型进程所激发的制度张力与治理错位问题。三重逻辑协同有助于揭示老年教育从“文化补偿”向“发展权保障”转向的深层理路,并为制度路径重构提供理论支撑。

(一)历史逻辑:经验知识合法性断裂与代际秩序的重构演化

在数字文明推动的知识重组与社会转型进程中,老年教育的历史逻辑正在经历深刻的断裂与重构。传统社会中,老年人以“口传心授”“实践积累”承载经验与文化,形成稳固的认知链条与伦理结构;在以算法和数据为核心的知识组织重构中,经验体系被边缘化,其正当性持续滑落。

一是经验价值削弱。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为代表的新型知识生成机制(单旭等,2025),推动知识从“文化遗产”走向“算法演绎”。老年人的默会知识显然会被平台算法边缘化,也就是说,以数据驱动、平台算法筛选机制为基本特征的数字技术系统加剧了“非标准化”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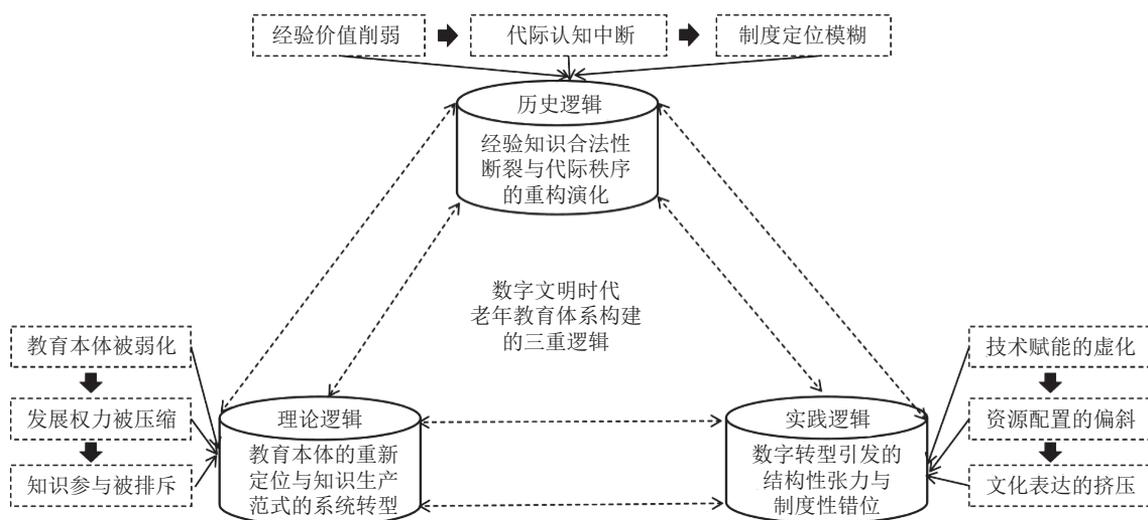


图2 数字文明时代老年教育体系构建的三重逻辑困境

“非结构化”知识的隐形剥离,老年经验在社会认知中逐步隐退。认知主体的权力转移削弱了“文化赓续”功能,老年人由“知识提供者”滑落为“适配对象”,甚至被视为“学习负担”。

二是代际认知中断。数字文明语境下,知识的更新趋向“替代式断裂”:青年成为信息首要接收者,老年人被“后排化”,老年人在教育系统中的认知能动性参与期待被系统压制,呈现“失速的主体”状态。老年教育因此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难以支撑个体发展的价值生成,另一方面亦难以承担代际互构的社会功能。

三是制度定位模糊。在传统社会结构中,“敬老尊贤”的价值观念赋予老年群体以知识传递者与文化守望者角色,老年群体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算法与流量逻辑主导的数字社会的发展,老年文化表达被压缩为低频通道,文化主体性受到结构性阻断。由此,代际之间原有的精神共识与认同机制被逐渐削弱,老年教育难以再作为文化互构的有效机制嵌入制度体系。

从历史逻辑看,随着知识更新机制由“累积传承”转向“算法替代”,老年人从文化主体逐渐退位为适配对象,传统社会赋予其知识与伦理地位遭遇系统性解构。经验价值削弱、代际认知中断与制度定位模糊相互交织,削弱老年教育在数字文明中的文化与社会功能,使其价值基础和制度归属亟需系统性重构。

(二)理论逻辑:教育本体重新定位与知识生产范式的系统转型

数字社会的演进重塑了教育的知识结构与主体关系,对老年教育的本体属性与价值逻辑提出根本性挑战。长期以来,老年教育被制度性地定位为养老体系的文化附属,功能认知多围绕“休闲性”“娱乐性”展开(马丽华等,2019),在教育话语中缺乏独立类型地位,权利属性尚未明确。

其一,教育本体被弱化。老年教育长期作为福利的文化延伸,缺乏理论的系统构建与制度的独立性。在传统教育观念中,老年教育常被视为“教育的终点”,学习活动仅以“非正式”“非功利”形态存在,致使老年教育长期游离于教育体系主干之外。有学者指出,“唯有让老年教育从崇尚力量的理性框架中跳出来,还原到人作为生命体本身的立场,方可使其回归‘育人’的本质”(吴遵民等,2022)。因此,国家亟需将其从“福利附属”转向“生命发展”的本体性制度安排。

其二,发展权利被压缩。照护逻辑主导的制度框架多聚焦“延缓衰老”“促进身心健康”,虽现实合理,但易遮蔽教育在认知建构、价值生成与社会参与中的核心功能。数字社会中,教育已成为身份建构与社会连结的重要机制,老年人需被制度性承认为具有成长潜能的“发展主体”,而非单纯的“照护对象”。老年教育理应回应其个性化诉求,将个体价值与制度安排相衔接,避免其主体性被政

策理性覆盖(Roberson et al., 2005), 发挥其在激活银龄资源、释放潜在人力资本的制度性功能。

其三, 知识参与被排斥。平台化、算法化的知识体系强化了主体间的等级分化, 老年人常被标签为“技术落后者”, 生活经验缺乏制度性表达路径。网络安全顾虑、技术信任缺失等因素, 使部分老年人对数字媒介产生持续性疏离感, 处于“信息中下层”(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成为数字网络结构的低连接群体(Cartier et al., 2005)。老年群体因缺乏“网络自信”(马丽华等, 2018), 不仅难以有效参与在线教育, 更面临在数字社会知识秩序中获得文化在场与表达权的困境。

从理论逻辑看, 老年教育的本体重估与知识范式转型, 是破解其制度性低位与实践性边缘的关键环节。确立其作为独立教育类型的制度属性、重构以“发展权”为导向的教育价值逻辑, 是推动老年教育融入主流教育体系的必要前提。在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构建进程中, 老年教育理应从“边缘变量”转为“制度常量”, 并以其独特的知识生态与社会功能, 参与构建更加公平、包容与可持续的教育体系。

(三) 实践逻辑: 数字转型引发的结构性张力与制度性错位

相较于理念更新与理论转型, 当前老年教育在实践层面的问题更具结构性与普遍性。以“青年中心化”为导向的产品逻辑, 不仅未能契合老年群体的认知特征与情感诉求, 反而强化其数字排斥与制度疏离感(陈德权, 2022)。在“数智转型”成为教育系统主导叙事的背景下, 老年教育正陷入制度供给薄弱、结构适配失衡与价值承载缺位等多重困境, 凸显了教育政策与老年人真实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位。

首先, 技术赋能虚化。“适老化”多停留于界面友好、操作简化等表层改进, 忽视技术系统对老年人认知路径、理解方式乃至学习动机的深层影响。数字平台虽在教育可达性上取得进展, 却在算法逻辑与平台结构中重塑了新的教育门槛。结果是, 数字赋能呈现“形式优先、内核空转”的治理特征, 缺乏内源动力(王驰等, 2025)与技能培育机制(宋月萍等, 2024), 未能真正激活老年人的学习能力与参与意愿, 甚至在结构性规训中削弱其能动性,

使原本意在提升教育公平的数字化转型反而异化为新的教育排斥机制与认知不平等来源。

其次, 资源配置偏斜。平台的中心化逻辑使发达地区与核心城市在课程、师资与服务能力上显著领先, 造成资源空间集聚与受众偏倚。尽管大数据治理与智慧化手段被寄望于能打破资源碎片化(杜春林, 2020), 基于点击率、流量与商业权重的算法却放大了区域、代际与能力的差距。农村及边缘地区老年人因网络覆盖不足、设备短缺及认知门槛等原因, 难以享有与城市老年人同等的数字教育红利(张正平等, 2018)。这种由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差异共同塑造的“结构性数字鸿沟”(陈梦根等, 2022), 不仅延续着既有社会不平等, 还使数字空间成为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重要场域。

再次, 文化表达挤压。在人工智能驱动的媒介环境中, 算法成为特定的数理语言(杨国荣, 2025), 倾向于优先推送标准化、流量化内容, 系统性地边缘化非标准、地域性与经验性的表达。老年教育维系集体记忆、延续生活方式与承载文化认同的功能被不断弱化, 教育内容呈“窄化”“休闲化”“松散化”倾向(王淑芳等, 2023)。老年群体作为“文化主体”的表达空间被持续压缩, 长期积累的生活智慧与文化资源难以获得平台入口, 文化再生产与社会记忆传承的制度能力下降。

从实践逻辑看, 老年教育的症结并非源于学习者能力, 而是数字转型过程中制度对“学习能力结构”“资源分配机制”与“文化表达路径”的系统性忽视。若不能有效回应老年群体的技术接入障碍、认知适配难题与文化表达诉求, 不仅会在数字语境下固化代际不平等, 还将阻滞老年教育的制度转化与机制重构。

三、重构路径

综合前述分析, 老年教育正面临三方面的结构性困境: 一是制度价值的边缘化, 导致资源保障不足、发展动力不强; 二是运行机制碎片化, 造成服务供给分散、效能不足; 三是文化功能弱化, 使教育难以深入社会与个体生活。这些问题根源在于制度层面对数字化教育形态和代际结构重构的回应不充分。随着数字文明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其时代性、共享性、全民性特征日益凸显(仰义方,

2025),教育的知识观、育人观和教学观正在发生系统性变革(杨现民等, 2025),不仅改变了知识生产方式和学习组织形态,也重塑了教育治理的基础性制度框架。然而,老年教育在制度响应、资源配置与服务供给方面仍存在滞后与割裂(马丽华, 2020),尤其是缺乏有效的文化转译与代际融合路径。

基于此,老年教育制度的重构应围绕“发展权—公平性—文化表达”三大制度诉求,分别在制

度价值、运行机制与文化功能三个维度上开展系统设计(见图2)。其核心路径为:针对制度价值的边缘化,明确制度定位与本体正当性,回应“发展权保障”的核心诉求;针对运行机制碎片化,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与效率供给,破解“治理协同与服务供给”的现实困境;针对文化功能弱化,激活文化功能与社会连接功能,弥补“文化表达与代际共建”制度的缺位(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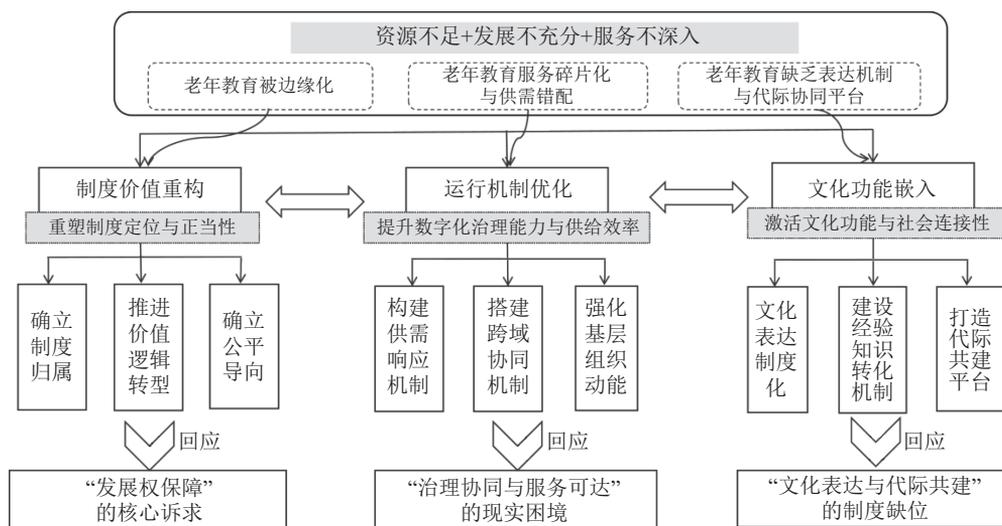


图3 数字文明时代老年教育的制度配置

(一)制度价值重构:确立面向发展权的教育正义逻辑

当前,我国老年教育在制度价值层面,因思想认识不到位、功能定位不全、支持条件不完善等(朱耀垠, 2025),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难以回应数字文明下老年人多元化、个性化与发展性的学习需求。这不仅关乎教育服务体系的完善,更关乎制度公平、文化权利与代际正义,亟需以“发展权”为导向推动制度价值的深层重构。

1. 明确老年教育的制度归属与本体正当性

长期以来,老年教育被置于养老体系的文化附属范畴,缺乏系统性顶层设计与明确的法定制度地位。这种“附属性”定位导致其在教育预算、资源配置与平台参与等方面处于不对称状态的制度结构中。尤其在数字平台成为知识生产与教育供给重要载体的背景下,虚拟与现实教育环境边界日益模糊,需要为学习者提供沉浸式、泛在化的学习体验(余胜泉, 2023)。然而,缺乏制度身份的老年

教育在平台服务规则中往往被功能化、娱乐化甚至被隐藏化,弱化了公共教育属性与发展功能。对比来看,英国开放大学将老年人的可认证学习纳入成人继续教育框架;韩国以K-MOOC对接学分银行,实现跨机构互认,老年课程具备可积累与可转换属性。这些实践有一共同指向:老年教育需被“安放”在正式制度与平台规则内,而非边缘外圈。

因此,要真正将老年教育纳入国家终身学习体系的核心架构,亟须在法律制度与政策体系中确立其作为公共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本体地位。这不仅是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制度回应,更是保障教育公平与学习权利的要求。

2. 重构以“发展权”为核心的教育正义

数字文明中,教育功能正由单一的应试准备与职业培训,转向涵盖认知能力、文化表达与社会参与能力的综合构建过程。数字时代的培养目标强调培养具有终身学习能力、人际合作、批判性思维与决策能力、数据分析与信息处理能力以及创新

实践能力的新型人才(王竹立等, 2024)。在生命历程的后期, 老年人的继续学习不应被视为补偿性安排, 而应被确认为实现发展权、社会参与与自我价值的重要路径。然而, 当前老年教育仍处于由“特殊福利”向“普遍福利”过渡阶段(吴玉韶等, 2025), 制度目标多聚焦于身心健康、社区融入等层面, 难以回应数字环境中老年群体所面临的认知危机、表达失语与制度疏离问题。国际上, 欧盟通过“微证书”以小单元认证贯通教育、就业与参与, 提升学习的可携带性与社会可见度; 第三年龄大学(University of the Third Age, U3A)等实践以兴趣—研究—公共参与为导向, 强调老年人的“主动发展”。

因此, 重构教育正义的制度逻辑必须以“发展权”为核心, 从“可供学习”迈向“可被发展”, 从“技术适应”迈向“主体赋权”, 保障每位老人接受教育、获得发展与表达自我的权利”。这不仅是对“老有所学”理念的深化, 更是“人的发展”思想在老龄社会与数字时代的制度化体现。

3. 强化公平导向下的制度目标重塑

数字公平已成为教育制度设计的基础问题。世界卫生组织自 2005 年起持续推动“老龄友好型城市(age-friendly cities, AFC)”理念, 强调制度环境支持老年人公平参与(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7)。我国明确提出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 缩小区域与群体间的数字鸿沟(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23)。但受城乡发展失衡与技术资源错配影响, “技术基础—资本动能—人才应用—生产扩散—权力核心”的城乡数字挤兑机制仍在加剧圈层化(曾凡军等, 2023)。在老年教育领域, 这种结构性不平等表现为地域间数字基础设施与服务能力严重分化, 以及平台算法逻辑选择性适配造成的教育资源边缘化。这不仅放大了技术鸿沟, 还加速教育资源与认知能力优势的代际集中趋势。在应对这些问题的路径探索中, 已有若干可资借鉴的实践。例如: “老龄友好型城市”框架下由公共图书馆与社区学院联合提供的设施、课程、学习支持一体化数字素养项目; 韩国政府为弱势群体发放“终身教育券”用于支付 K-MOOC 或地方学习中心课程费用, 推动老年群体的数字化学习参与。

因此, 国家应以数字包容为导向重塑制度目标,

构建循环共生、内外贯通、渗透联创的数字生态体系(匡亚林等, 2025), 从“单一适老”迈向“代际协同”, 同时注重对弱势群体识别机制与差异化服务供给。唯有如此, 方能推动教育治理机制实现对不同年龄、地域与能力群体的公平响应与合理分配, 真正落实数字文明时代的教育公平理念。

(二) 运行机制优化: 构建数据驱动下的协同治理结构

研究表明, 我国老年教育运行机制在制度设计与实践运作之间存在显著落差, 表现为治理逻辑滞后、资源配置割裂与服务供需错位等结构性困境。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运行机制仍停留在行政主导、项目驱动和线下供给的范式中, 缺少与数字化发展相适配的制度协同与平台化运作模式。随着数字平台逐步成为教育服务组织的核心单元, 老年教育需要重构治理逻辑与组织模式, 实现供需精准匹配、流程柔性调度与服务高效协同。

1. 构建多源数据支持的供需弹性响应机制

数据已成为教育治理的重要基础资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评选的教育数字创新项目表明, 基于数据智能实现教育内容推送、学习过程分析与资源精准投放已成为国际趋势(Miao & Jet Education Services., 2022)。相比之下, 我国老年教育在数据采集、需求分析与服务反馈机制等方面仍较薄弱, 平台未建立涵盖老年人学习行为、能力水平、兴趣偏好的动态数据库, 难以实现精准匹配。

因此, 我国亟须构建“数据中枢—智能分析—响应调度”相联动机制, 推动老年教育从被动供给向精准服务转型, 具体可从三方面入手: 一是数据整合建模, 即整合来自社区、平台、教育机构的多维数据, 形成完整的老年学习者画像; 二是智能分析驱动, 即引入学习行为分析、兴趣挖掘与服务预测模型, 实现从“统一供给”到“个性推荐”的模式转型; 三是跨域数据联通, 即打通教育数据与政务数据, 提升政策制定与资源调配的敏捷性与精准性, 构建弹性调度、可持续优化的供需联动机制。

2. 搭建平台协同导向的跨域治理机制

在数字文明时代, 教育供给呈现平台化、多元化、网络化趋势。我国正积极推进全球新一轮数字革命浪潮, 加快推动虚拟学习平台建设终身学习体系融合发展(王萌萌, 2022)。然而, 老年教育

治理仍广泛存在“职能碎片化”“条块分割”“系统不贯通”等问题。教育、民政、卫生、文化等部门在职责划分与资源整合上缺乏有效协同,导致服务重叠、资源浪费与需求错配。研究表明,数字平台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技术性能,更依赖于构建互惠共生的生态系统,使各参与方实现有效互动与利益联动(Gawer, 2014)。

为此,我国需推动从“部门分治”向“平台共治”转型:一是推动构建统一的老年教育综合服务平台,打通教育资源发布、学习过程跟踪、服务质量评估与政策反馈等功能;二是建立多部门数据共享机制,促进教育与健康管理、社区服务、文化供给等领域的信息流动与政策协同;三是保障公众在老年教育政策执行中的参与权和话语权(杨波, 2020),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接口开放与认证机制,吸引社会组织、企业、专业机构参与供给与治理,形成“政府引导—平台支持—社会协同”的复合治理格局。通过上述机制创新,老年教育治理将实现从“政府包办”向“多元参与”、从“职能分割”向“协同融合”的根本转变。

3. 夯实基层组织的能力支持与服务动能

老年教育的有效运行最终落脚于基层,但在我国现行教育体系与老龄事业结构中,老年教育长期处于“拾遗补阙”或“锦上添花”的边缘地位(沈光辉等, 2021)。目前多数地区的基层组织普遍面临数字化运营能力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组织机制不健全等现实困境。教育组织者亦缺乏融合老龄心理、数字技术与课程管理的复合能力。国际经验表明,将基层作为“平台—终端—用户—数据”闭环的关键节点,有助于显著提升可及性与协同效率。日本公民馆常态化开设老年数字素养课程,并与市町村图书馆、社会教育馆共享场地与师资,形成“场地+课程+指导员”的协同网络;美国公共图书馆体系(如 PLA 的 DigitalLearn)为老年人提供入门培训与一对一辅导、配套设备,把数字学习嵌入社区日常服务。

运行机制的优化需下沉重点,提升基层的技术适应力、服务响应力与制度执行力。这包括:1)优化能力体系,构建覆盖数字素养、老年心理、课程组织与平台使用的在岗培训与认证体系,鼓励“高校—社区—公共文化机构”共建师资与实训基地,

确保培训可记录、可转换;2)推动“人机协同”,在基层落地“一键直达”的无障碍界面,引入 AI 助教,配合流动设备与场景化支持(如图书馆、社区学习点与设备借用),以技术手段弥合服务落差;3)强化财政保障与绩效,以“中央平台+地方终端”组织模式完善经费保障与激励,将参与率、完成率、学习成果与数据质量高低(留痕、回流、应用)等指标纳入评价,通过落实基层“最后一公里”机制,推动平台治理逻辑在地化、具体化、生动化,构建可持续、可信赖、有温度的老年教育制度基础。

(三)文化功能嵌入:推动知识转化驱动下的代际共建机制

长期以来,老年教育在文化功能上的制度表达薄弱,数字平台主导的舆论生态进一步压缩老年群体的表达空间与文化能见度,如算法可见性不足、内容适配性弱、制度承认度低,导致代际间的情感连接与认知共鸣减弱。数字文明的加速演进,亟须通过制度认知、知识转化与代际协同,系统提高老年教育的文化能见度与公共参与性。

1. 重构老年文化表达的公共价值与平台支持体系

在我国,文化软实力与教育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高度统一的战略互构性(刘益东, 2024)。研究表明,老年教育发展既受资源、设施、师资等结构性因素制约,也深受价值观与社会认知等文化因素影响。“结构为基,文化为要”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赵一红等, 2025)。然而,结构性供给与文化性建构之间的失衡问题日益凸显,与老年人精神需求相匹配的表达机制缺乏。平台长期受流量逻辑与年轻用户偏好支配,老年群体陷入“有文化无平台、有声音难传播”的表达困境,与老年人的需求结构正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国务院, 2022)不吻合。

老年文化表达需纳入数字时代公共教育的重要议程:一是支持基于老年人生活经验的文化内容创作与数字化再现,如社区记忆工程、数字非遗叙事等;二是构建面向老年人的内容推荐规则与语义识别模型,提升公共平台文化能见度;三是将老年教育机构纳入教育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考核与平台资源扶持机制,推动老年人从“文化参与者”向“文化共建者”角色转变,如老年友好型大学

(Age-Friendly University, AFU)全球网络将老年人的文化参与与传播纳入大学治理与资源配置机制,推动高校成为代际文化共建的枢纽平台。经由这些制度性安排,老年教育才能真正实现从“安置型”向“参与型”“发展型”的深层转变,并在促进文化共建与代际理解中发挥制度性功能。

2. 构建老年经验的知识转译机制与表达体系

老年群体蕴含着丰富的生活智慧、劳动技能与历史记忆,是文化延续与社会认同的重要载体。然而,在以“数字逻辑”为主导的教育与知识体系中,这些非形式性知识与在地性经验缺乏表达通道与评价机制,难以进入公共教育资源体系并实现世代共享。知识转译(knowledge translation)概念为此提供了有益启示,它强调知识的传递方需依照受众的认知结构、语言体系和使用场景进行筛选与重构,以增强其可理解性与可操作性(Hohd et al, 2014)。老年人力资源不可再生,不及早开发将逐年衰减(阳义南, 2025)。将老年经验进行知识转译,意味将分散的生活智慧与文化记忆系统化处理,使其在数字平台与公共平台被看见、被传播、被使用。

知识转译机制构建可从三方面展开:一是设立老年经验采集与知识转化支持项目,鼓励社区教育机构、高校、媒体平台开展“口述历史”“地方技艺”等数字采集与课程转化项目,实现经验到课程的系统转译;二是建立知识转译标准与内容认证体系,制定适用于老年知识的表达标准与认证规则,推动非正式知识的结构化呈现与平台适配,使其具备可传播性、可评价性与可沉淀性;三是推动转译成果进入正规教育与公共文化体系,如将老年教育纳入社区教育资源库、地方课程开发、城乡文化交流活动,实现知识成果的代际共享与公共使用。知识转译有助于提升老年教育的文化深度与制度地位、打破年龄与知识之间的结构性隔阂,构建共生共融的代际知识生态。

3. 打造代际协同导向的文化共建平台

数字化社会呈现出“分散权利、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的核心特质(尼古拉·尼葛洛庞蒂, 1997),为重构代际关系提供了可能。但在平台逻辑驱动下,注意力竞争与算法分割亦放大了代际沟通张力,使认知方式、媒介习惯与文化价值取向进一步分层。传统以“长幼有序”为特征的单向

传承缺乏共享机制与协同表达空间而出现断裂。研究表明,代际服务学习通过共同任务与真实情景可以有效缩短代际距离(Andreoletti & Howard, 2018)。在此背景下,代际互动正由单向话语让渡,转向多元主体参与的文化共创与共流动过程(高贵武等, 2022)。因此,老年教育应成为代际融通的平台、文化共识的载体与社会信任的生成机制。实现这一转向可从三方面着力:

一是制度化教育项目联动。推动老年教育与青少年教育协同,设计如“祖孙共课”“代际文化访谈”“记忆地图计划”等活动,引导围绕地方文化、家庭记忆与生活智慧共创,强化双向认知与情感连接,推动经验与价值的代际循环。二是数字平台协同适配。开发适配多代群体的协同模块,兼顾老年用户的便捷性与青少年的表达自由,避免技术与设计壁垒造成结构性排斥,构建“数字共在”的互动空间。三是成果传播与激励机制联动。将代际共建成果纳入公共传播渠道与激励体系,如设立“代际共创奖”“社区协同典型案例”等,并嵌入地方文化建设、社区治理与教育评价体系,提升代际协同的可见性与可持续性。

四、结语

在数字文明与长寿社会的历史性交汇中,老年教育不仅面临知识范式、制度结构与价值逻辑的多重转型挑战,更承载着重塑教育公平、推动代际共生与维系文化记忆的深层社会功能。本研究从历史、理论与实践出发,揭示当前老年教育在知识正当性、主体性承认与制度适配方面的深层困境,提出数字文明背景下制度转化路径:制度价值重构、运行机制优化与文化表达嵌入。首先,老年教育的制度重构必须摆脱“补偿性照护”的工具主义逻辑,确立其作为发展权与教育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教育本体地位、发展逻辑到代际公平目标重构制度价值的转变,不仅是理念层面的更新,更是公共资源分配与治理结构安排的再定位。其次,机制层面的优化需以数据驱动与平台治理为核心支点,建立供需响应、算法调控与能力支持相互嵌套的系统性运行结构。这不仅关乎教育资源的分配效率,更关系老年人在数字社会中能否实现“有效可见”与“平等参与”。最后,文化功能的嵌入意味

着老年教育不应被简化为内容消费或情绪慰藉,而应通过制度化的知识转译、场景构建与代际协同机制,重建其在公共文化、社会表达与数字治理中的核心角色,使其真正成为推动数字社会人文转向的重要力量。

从长远看,老年教育的制度重构不仅关涉群体的学习机会,更是国家教育体系现代化与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唯有正视老年人作为“学习主体”“文化主体”“制度主体”的多重身份,国家才能在数字浪潮中迈向包容、共享、有尊严的学习型社会。未来,我国仍需从立法推动、标准建设、跨部门协同等维度持续深化,推动老年教育制度体系从“被动适应”走向“主动塑造”,使其真正嵌入国家终身学习战略与数字文明建设全局。

[参考文献]

- [1] Anderson, J., & Rainie, L. (2017). Code-Dependent: Pros and Cons of the Algorithm Age[EB/OL]. (2017-02-08)[2025-02-16]. <https://eloncdn.blob.core.windows.net/eu3/sites/964/2019/07/Pew-and-Elon-University-Algorithms-Report-Future-of-Internet-2.8.17.pdf>.
- [2] Andreoletti, C., & Howard, J. L. (2018). Bridging the generation gap: Intergenerational service-learning benefits young and old[J]. *Gerontology & Geriatrics Education*, 39(1): 46-60.
- [3] 仰义方(2025). 数字文明建设的出场逻辑、现实悖论与突破路径[J]. *思想教育研究*, (4): 72-78.
- [4] Cartier, C., Castells, M., & Qiu, J. L. (2005).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equality, mobility, and translocal networks in Chinese cities[J].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40(2): 9-34.
- [5] 陈德权, 杜天翔(2022). 数字适老化的实践逻辑、概念阐释与实现路径[J]. *电子政务*, (12): 45-52.
- [6] 陈梦根, 周元任(2022). 数字不平等研究新进展[J]. *经济学动态*, (4): 118-125.
- [7] 崔建西(2025). 中国式数字文明的生成逻辑、核心特质与实践路径[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 12-21.
- [8] 单旭, 张成昱, 李骐安, 等(2025). AIGC时代知识服务领域发展趋势[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1): 47-56.
- [9] 杜春林, 臧璐衡(2020). 从“碎片化运作”到“整体性治理”: 智慧养老服务供给的路径创新研究[J]. *学习与实践*, (7): 92-101.
- [10] 国家统计局(2025). 全国分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镇)[EB/OL]. (2025-01-17)[2025-02-11]. <http://stats.gov.cn/sj/pcsj/rkpc/6rp/html/B0802c.htm>.
- [11] Gawer, A. (2014). Bridging differing perspectives on technological platforms: Toward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J]. *Research policy*, 43(7): 1239-1249.
- [12] 国务院(2022).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EB/OL]. (2022-02-21)[2025-01-22].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2/21/content_5674844.htm.
- [13] 高贵武, 李政(2022). 数字时代下代际冲突的动因与影响——基于跨文化传播视角的再考察[J]. *中国青年研究*, (6): 40-47.
- [14] Hohd, G., & Ganesan, S. (2014). Does knowledge base compatibility help or hurt knowledge translation between suppliers in competition? The role of customer participation[J]. *Journal of Marketing*, 77(6): 91-107.
- [15] 匡亚林, 吴佳馨(2025). 数字共生: 农村老年群体数字包容生态体系构建[J]. *江苏社会科学*, 339(2): 132-141.
- [16] 廖小丹, 吴艳东(2023). 中国式数字文明的伦理意蕴、发展趋势及建构理路[J]. *学术探索*, (9): 49-55.
- [17] 罗强强, 郑莉娟, 郭文山, 等(2023). “银发族”的数字化生存: 数字素养对老年人数字获得感的影响机制[J]. *图书馆论坛*, 43(5): 130-139.
- [18] 刘益东(2024). 文化软实力与教育强国建设——国际比较视野中的中国实践[J]. *教育研究*, 45(5): 15-29.
- [19] 刘卓红, 刘艺(2022). 中国式数字文明的形成、特征与意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J]. *学习与探索*, (7): 1-8+182.
- [20] 马晓强, 崔吉芳, 万歆等(2025).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的人口战略指向[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02): 3-14.
- [21] 马丽华, 叶忠海(2019). 中国老年教育的嬗变逻辑与未来走向[J]. *南京社会科学*, (9): 150-156.
- [22] 马丽华, 丁沁南, 张永(2018). 老年学员网络自信影响因素路径分析[J]. *开放教育研究*, 24(3): 113-120.
- [23] 马丽华(2020). 我国老年教育转型发展: 理论重构与策略选择[J]. *教育发展研究*, 40(17): 28-35.
- [24] Miao, F., & JET Education Services. (2022). Innovative use of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Winning projects of UNESCO's King Hamad Bin Isa Al-Khalifa Prize[R]. Paris: UNESCO. <https://doi.org/10.54675/GQRK8672>.
- [25] [美] 尼古拉·尼葛洛庞蒂. 数字化生存(1997)[M]. 胡泳, 范海燕,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269.
- [26] Roberson, D. N. Jr., & Merriam, S. B. (2005). The Self-Directed Learning Process of Older, Rural Adults[J]. *Adult Education Quarterly*, 55(4): 269-287.
- [27] 宋月萍, 彭可余(2024). 面向老龄化的数字社会治理: 现实、演变与未来进路[J]. *江西社会科学*, 44(5): 118-128.
- [28] 沈光辉, 蔡亮光(2021). 赋权增能理论视域下老年教育转型发展探究[J]. *湖北社会科学*, (11): 142-147.
- [29] 吴遵民, 姜宇辉, 蒋贵友(2022). 论老年教育的本质——基于世界图景演变视角的分析[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34(1): 11-20+39.
- [30] 王竹立, 吴彦茹, 王云(2024). 数智时代的育人理念与人才培养模式[J]. *电化教育研究*, 45(2): 13-19.
- [31] 吴玉韶, 李晶(2025). 学习是最好的养老: 老龄社会背景下老年学习服务体系建构[J]. *人口研究*, 49(2): 3-16.
- [3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7). *Global Age-friendly Cities: A Guide*[R].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58-59.
- [33] 王驰, 雷震(2025). 数字化赋能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多维语

境、关键挑战与优化路径[J]. 社会科学家, (2): 169-174.

[34] 王淑芳, 马丽华(2023). 增能理论视域下老年教育课程建设的理念优化与实践路径[J]. 成人教育, 43(4): 15-19.

[35] 王萌萌(2022). 终身学习对数字化和新技能的回应——基于《数字教育行动计划》和《欧洲技能议程》的分析[J]. 现代远程教育, (2): 90-96.

[36] 肖峰(2015). “信息文明”的语义分析[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9(1): 112-118.

[37] 杨国荣(2025). 如何理解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哲学考察[J]. 浙江学刊, (3): 5-13.

[38] 杨现民, 张盛, 李新(2025). 迈向数字文明的教育生态重塑与深思[J]. 远程教育杂志, 43(1): 11-18.

[39] 余胜泉(2023). 智能时代的未来教育愿景[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18): 32-43.

[40] 汤波(2020). 如何破解老年教育政策执行困境: 基于政策网络理论视角[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32(6): 60-68.

[41] 阳义南(2025). 我国潜在老年人力资源的测度、识别与析因[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75(2): 191-204.

[42] 张正平, 杨舒菡(2018). 信息技术发展对中国农户贷款规模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3(2): 96-102.

[43] 朱耀垠(2025). 完善多样化的老有所学服务体系[J]. 人民论坛, (2): 68-73.

[44] 中共中央 国务院(2023).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EB/OL]. (2023-02-27) [2025-01-19]. 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2/27/content_5743484.htm.

[45] 曾凡军, 王鹏(2023). 城乡数字势差与逆差序智治——基于“技术—社会”整合性框架的分析[J]. 云南社会科学, (5): 171-180.

[46] 赵一红, 刘沛鑫(2025). “结构—文化”二元共进: 我国老年教育服务体系供需协调发展[J]. 社会发展研究, 12(1): 224-241+246.

(编辑: 赵晓丽)

When Algorithms Meet Silver Hair—Logical Dilemmas and Institutional Pathway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Older Adult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Digital Civilization

MA Lihua

(Facult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With a continuously evolving digital civilization intertwined with declining birth rates and accelerating deep aging, elderly education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blurred institutional positioning, outdated value logic, and fragmente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which hinder its ability to effectively respond to increasingly diverse and developmental learning needs. Based on the triple logic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oretical paradigms, and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this study reveals deep-seated dilemmas in elderly education, including the weakening of knowledge legitimacy, the absence of educational ontology, and structural institutional misalignment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institutional reconstruction should be advanced systematically in three dimensions: establishing a development rights-oriented logic of educational justice to clarify institutional attribution and equity objectives; building a data-drive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to achieve precise matching of resources and demands as well as platform coordination; and embedding cultural functions and knowledge translation mechanisms to strengthen experiential expression, intergenerational co-construction, and digital participation. This 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 pathway can help shift elderly education from a welfare-affiliated position to a public service function, enhancing its strategic role within the national lifelong learning system and reshaping a Chinese model that balances digital equ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integration.*

Key words: *digital civilization; elderly education; lifelong education; logical dilemmas; 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